

# “纶巾”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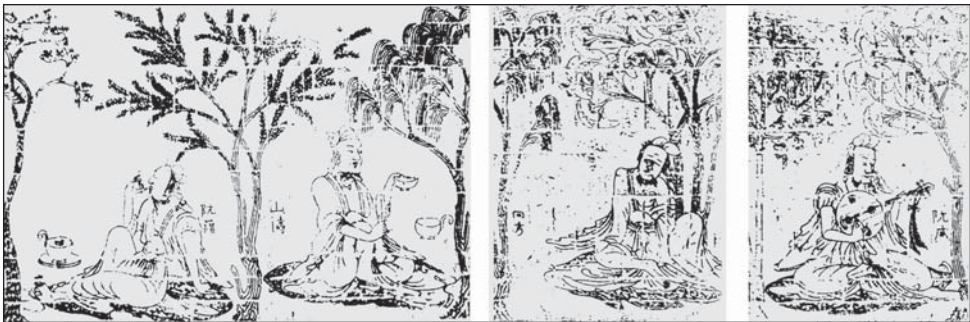
□马里扬

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“羽扇纶巾”的形象，究竟是指周瑜还是指诸葛亮，仍旧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。无论当日苏轼意在谁属，到了南宋后期词人吴文英的笔下，着实落在了诸葛亮的身上：“记羽扇纶巾，气凌诸葛。”（《江南春》）至于再后来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里，诸葛亮一亮相便已是“头戴纶巾，身披鹤氅”。但“纶巾”究竟是何物？新中国成立以来，质量较高、影响较大的宋词选本如夏承焘、盛弢青先生选注的《唐宋词选》、胡云翼先生选注的《宋词选》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选的《唐宋词选》等，对“纶巾”有着基本一致的解释：“青丝带的头巾。”但在普通受众心目中，从明代的绣像小说开始，一直都将诸葛亮的“纶巾”描绘成一种向后延伸的卷云梁冠的模样。这里的问题是：专家所谓的“青丝带的头巾”，是否有足够的文献依据？而民众对纶巾的认识，虽不免想当然，但这想当然之中，是否也含有历史的真相？针对这些疑问，本文将对纶巾之形制、演变试作一考证。

幅巾之流行于汉末魏晋，是可以从诸葛亮着巾谈起的。唐·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六七引东晋处士裴启的《语林》云：“诸

葛武侯与宣皇（司马懿）战于渭滨，将战，宣皇戎服莅事。使人视武侯，乘素舆，葛巾毛扇，指麾三军。”仅从字面上看，这一段文字中的“葛巾”自与后人心目中诸葛亮的“纶巾”形象有异。其实，若由当日习俗视之，尚存在一定关联。《晋书·舆服志》云：“巾，以葛为之，形如帽，而横着之，古尊卑共服也。”《语林》中的“葛巾”，仅就“巾”的材质言之，而未及式样。《晋书》中称其“形如帽”，而关于“帽”的式样，《舆服志》又云：“魏武以天下凶荒，资财乏匮，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帽，合乎简易随时之义，以色别其贵贱。”是将“帽”的形制引向了“弁”。但这种“巾”的式样，是否就是“纶巾”，尚难以确定。

文献中最早出现“纶巾”字面的，是在《世说新语·简傲篇》里：“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。尝着白纶巾，肩舆径至扬州听事，见王直言。”谢万着“白纶巾”事，也见于《晋书·谢安传》。其本传中尚有谢万“着白纶巾，鹤氅裘，履版而前。既见，与（简文）帝共谈移日”的记载。又《晋书·石季龙载记》云：“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，皆着紫纶巾、熟锦裤、金银镂带、五文织成靴，游于戏马观。”这三条文献合观，得出的结论是：“纶巾”虽是当日名士



“竹林七贤图刻砖”中的阮籍、山涛、向秀与阮咸

的服饰，亦波及“夷狄”，甚至成为潮流，故羯人石季龙的仪仗队里的女骑也着“纶巾”，此其一。其二，“纶巾”二字所示与颜色无关，故有白纶巾、紫纶巾之说。因此，所谓“青丝带的头巾”，这个“青”字是不准确的；而“丝带的头巾”虽是就其样式来讲，但究竟是怎样“丝带的头巾”，也并不能说明。

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形下，出土实物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。1960年南京西善桥六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图刻砖，是魏晋时代着巾样式的一个大展示。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：“画中几种巾裹相当草率，也相当重要。”

“竹林七贤图刻砖”共绘有八个人物：竹林七贤与荣启期。其中可以明显看出是裹巾子的有四人：阮籍、山涛、向秀与阮咸。阮籍作侧面吟啸状，他的巾子有一层层的褰积，并能明显看出在脑后打有结，剩余的丝巾披散至肩。山涛作饮酒状，他的巾子为横裹式，《晋书·舆服志》所说的“巾以葛为之，形如帽，而横着之”，应与此相距不远。向秀作依树状，他的巾子随之向一侧倾斜，亦有层层褰积，脑后飘有束结后余留下来的一股股的丝

带。阮咸作弹奏乐器状，即“擘阮”，他的巾子有着层数更多且更为明显的褰积，已将整个额以上包住，多余的丝巾也是可以看出拂在脑后的。以上四人的巾子，大体可以分为两类：一为“横裹式”，为山涛所著；一为头顶的巾子有层层褰积且脑后都有束结后的丝带，简言之即“褰积丝带式”，阮籍、向秀、阮咸即着此类巾子。现在的问题是：虽然这幅图像呈现了当日真实的着巾风貌，但其中究竟哪一种是“纶巾”甚或一种也不是？对此要作出判定，需要结合“纶巾”这一名称的语源。

何为“纶”？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纶，纠青丝绁也。从糸，仑声。”段玉裁注云：“纠，三合绳也，纠青丝成绁，是为纶。郭璞赋云‘青纶竞纠’。”按：“郭璞赋”即郭璞《江赋》：“青纶竞纠，縿组争映。”这里的“纶”是指水草，而非绁带。李善注引《尔雅》云：“纶似纶，组似组，东海有之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：水草的“纶”与“组”的形状类似于绁带的“纶”与“组”。而这种水草之所以名为“纶”，则是因为其形状类腰间所系之绁带的“纶”。由此可见，“纶”本义是绁带。那么，“纶巾”即应指

类同于绶的丝带与幅巾的结合，是两物样式的综合称法，简言之可以列出这样的等式：纶巾=纶+巾。它的样式，应该类同于“竹林七贤图刻砖”中的“褰积丝带式”，即以一整副头巾将额头以上层层包住，而将余留在脑后的部分纠结成一股股丝带。

那么，这种“褰积丝带式”的“纶巾”是如何发展成向后延伸的卷云梁冠式的“纶巾”，并在明清两代得到了官方认可的呢？

首先，汉代的服饰，到了唐宋人那里，也只是存留《舆服志》上的名目，而不见了实物。因此，虽然在唐宋的文字中、画中甚至日常生活中，尚有这些名称，实质已大不同。至如“纶巾”，唐宋人也是常挂在嘴边的，如唐·白居易《题玉泉寺》诗云：“手把青筇杖，头戴白纶巾。”宋·林逋《湖山小隐》诗云：“闲搭纶巾拥缥囊，此心随分识兴亡。”这里的“纶巾”是否就是诸葛亮时代的“纶巾”，是很难讲的。唐宋人虽也着巾，但更为流行的已是幞头、方山巾之类，已然见不到那种“褰积丝带式”的头巾。因此，若想从巾子的演变中求得“纶巾”发展的轨迹，则因实物缺乏，只能宣告此路不通。

这里我们想从另一种“头衣”——“梁冠”的演变中来观照明以来受众心目中的“纶巾”。关于“梁冠”在汉至唐宋时的变化，沈从文先生有一段精到的论述，他说：“唐宋式向后延伸卷云梁冠，汉代画刻中实未发现。似是唐人根据晋代巾帟褰积法作成，首先用于宗教画中诸天形象，后人

作《洛神赋图》、《朱云折槛图》、《却坐图》，才转到古代帝王头上。事实上汉代卷梁冠，大多只是指东汉以来一般前上耸后邪斜式而言，和唐宋人图画中梁冠少共同处。”是汉代的“前上耸后邪斜式”梁冠至唐代，已然为“向后延伸卷云”式了，产生这样的变化，沈从文先生推测是源于“晋代巾帟褰积法”。而明人所绘诸葛武侯的“纶巾”，正是仿制了唐宋时“梁冠”。若追溯其源，也是与魏晋时代“褰积丝带式”之“纶巾”有着密切的关联的。正因有此难以割裂

的“血缘关系”，明人这种“向后延伸作卷云梁状”的“纶巾”的存在，也就不是向壁虚构，全无巴鼻了。



故宫南熏殿藏诸葛武侯像，其所着纶巾为“卷云梁冠式”。

由此可以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两个疑问作一回答：魏晋时“纶巾”的得名源于本用作绶带的“纶”与裹头的“巾”，其式样呈“褰积丝带式”，今有“竹林七贤图刻砖”可供参照。至于明以来“向后延伸作卷云梁状”的“纶巾”实是对唐宋“梁冠”之形制的仿造；又因此“梁冠”的出现是受到魏晋“褰积式”巾子的影响，故仍旧保留了部分的历史真相。

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中文系